



余红〇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卢汉与昆明起义



余红◎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卢汉与昆明起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卢汉与昆明起义 / 余红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2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6211-2

I. ①卢… II. ①余… III. ①卢汉 (1895 ~ 1974) — 人物研究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 武装起义 — 史料 — 昆明市
IV. ①K827=7②K266.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664号

书 名	卢汉与昆明起义
作 者	余 红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徐荣仁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畅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开本 2.375印张 64千字

ISBN 978-7-5415-6211-2
定价 4.80元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景？！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赐、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梵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1
一、走马上任，主政云南	2
二、审时度势，寻找出路	12
三、中共指路，多方策反	21
四、举棋不定，形势逆转	32
五、大势已去，决心起义	39
六、揭竿而起，走向光明	46
七、蒋军围攻，临危不惧	54
八、迎军接管，欢庆胜利	61

前 言

在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经过中共中央和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长期争取工作，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顺应历史潮流，在昆明率领所属第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驻昆明的部分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接着，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外，省内各地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及全省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昆明起义，有利于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歼灭西南地区和云南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快了西南和云南解放的历史进程，使昆明和云南避免了更大的战争破坏，人民未遭到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并且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昆明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起义将领卢汉也作为一名爱国民主主义者而载入光辉的史册。



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



一、走马上任，主政云南

卢汉（1895～1974年），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炎山人，彝族。卢汉出身于奴隶主家庭，从小喜爱舞枪弄棒，与云南地方实力派重要人物龙云、龙泽汇家族联姻，互以表兄弟相称，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掌握军权的重要人物。1911年，年仅16岁的卢汉与表哥龙云在四川参加魏焕章部同志军，12月投入滇军，次年5月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14年，卢汉从讲武堂毕业后，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随后参加了省内外的军阀混战。1921年2月任滇军第十二团第三营营长。1922年3月任滇军近卫第三团团团长。1925年2月，升任滇军第七旅旅长。1927年6月14日，因权力争夺，蒙自镇守使胡若愚联合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发动政变，派兵包围昆明镇守使龙云住宅，龙云被擒关押。事变中，胡、张也派兵包围了时为龙云亲信部属的卢汉的住宅，卢汉机敏地翻围墙逃出，至滇西元谋重振旧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二师师长，率部为前锋，力战胡若愚、张汝骥部，回师昆明，救出龙云，并将龙云扶上云南省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宝座，从此，与龙云结为生死之交。1929年底，卢汉任九十八师师长兼云南省财政厅厅长。1930年5月，任讨逆军第十路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两万余人进军广西，以失败而告终。龙云决定“废师改旅”，遭到手握兵权的师长们的反对。1931年3月10日，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在宜良召开“倒龙”会议，要求龙云下台。然而，龙云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政变以滑稽闹剧而结束，龙云返回昆明继续执掌云南大权，卢汉与龙云的关系为此蒙上阴影。龙云以卢汉以下犯上，将其改任云南全省督练处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滇军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卢汉任军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卢汉率第六十军参加徐州会战，在台儿庄与日军



展开激战。8月，六十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卢汉任军团长。12月，第三十军团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卢汉先后任副总司令、总司令。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为防止日军侵入滇南，同年9月，设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司令。1941年秋，设立滇越边区总司令部，卢汉任总司令。1945年春，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任总司令，授中将加上将军衔。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铲除异己、改组云南省政府，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委派时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的



时任六十军军长的卢汉

卢汉为中国方面受降官，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1945年9月1日，卢汉指挥所属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三军、暂编十九师、暂编二十三师、第九十三师等部队，分5路进入越南。9月中下旬，卢汉所部各军、师克服道路困难，全部到达越北集结地区，总计5个军（后增加五十三军）、3个独立师共20万人，其中包括滇军两个军、两个师。9月28日，卢汉在越南河内法国驻越总督府内正式举行受降仪式，接受越南北部近3万日军的投降。

就在卢汉率部入越受降之际，昆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十三”事变。长期以来，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蒋介石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特别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开展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也积极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矛盾，按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



巩固势力，团结以民盟为主的各种进步力量，争取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从而促进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逐渐认清并抵制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昆明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持默许同情的态度，在昆明形成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云南政局的走势，蒋介石是无法容忍的。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内战后方基地，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紧锣密鼓地着手解决“云南问题”。



由于滇军被抽调随卢汉到越南受降，驻守昆明的滇军只有暂编第二十四师，给蒋介石解决云南问题创造了机会。一切准备就绪后，1945年10月2日深夜，蒋介石签署了改组云南省政府的命令，决定撤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免去龙云担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军管区司令等职务，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3日凌晨，驻防昆明的国民党中央嫡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按蒋介石命令率部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和滇军驻地，与滇军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经过3昼夜的僵持，龙云被迫于6日前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任命远在越南受降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同时任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为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省主席，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建立起了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统治体系。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除掉龙云这一心腹大患的最终目的，是要镇压云南的民主运动。他叮嘱李宗黄到云南后必须消灭“三害”：一是民主堡垒，二是学生运动，三是地方军政系统。“十三”事变使云南形势陡变，加剧了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使云南民主力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十三”事变发生时，卢汉正专心于在越南的受降事宜。龙云暗中联络并盼望卢汉回师云南，保驾护航。滇军中部分官兵也主张打回云南去。但一向做事谨

慎的卢汉并没有轻举妄动，他召集身边的幕僚密商对策后，认为率军回滇已无济于事，且使龙云有生命危险，遂镇静以处，不动声色。卢汉还应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要求，亲笔修书一封，派人送给龙云，劝他早日赴重庆就任新职。随后，卢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越南的防务交给法军，对部队进行调整、调遣，在河内将所掌握的滇军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的两个军、8个师进行了整编，合并为两个军、6个师，对部队人事也作了较大调整。1946年春，滇军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先后被海运至东北，参加内战。卢汉第一方面军所属其余各部也陆续撤回国内，分驻各地，交其他将领指挥，卢汉自此失去兵权。



卢汉被蒋介石夺去兵权后，只剩下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但他对自己能否当上主席并无把握。在越南，他早已听说李宗黄上台后，俨然以省主席自居，在蒋介石的直接支持下，李宗黄任用亲信，清除异己，排斥云南地方势力，积极镇压云南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规定了严格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搜查“散兵游勇”、“安定地方”为名，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昆明街头一时遍布特务，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这些倒行逆施，引起云南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云南地方势力中的许多人士对李宗黄采取不合作或抵制的态度。短短两个月内，云南一时风云变换，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其实，蒋介石最初并不想让卢汉真正掌握云南地方实权，只想借卢汉的名义安抚云南民众及地方势力，以稳定云南的局势，而最终代以亲信李宗黄。早在1945年7月23日，蒋介石策划剪除龙云、改组云南省政府的行动时，就召见李宗黄并向他交了底：“在过渡期间暂以卢汉负云南省政府的名义，而以兄任民政厅长兼代主席，到了相当时刻，再为真除。这样做，对政略的运用，较有裨益。”并再三叮嘱李要“特别缜密”。10月2日李宗黄临赴滇前，蒋又嘱：“卢汉在越

受降，一时不回，你可放手做。”^①于是，蒋介石对卢汉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的方针。他虽不得已用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要他交出对滇系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的指挥权，从而使卢汉“舍军就政”；他既授卢汉省政府主席，又设置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派亲信掌管，还派嫡系部队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以掣肘。

对蒋介石的企图，卢汉心知肚明。作为龙云之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卢汉不甘心中无权，想方设法要在云南范围内取得和行使自己的控制权。卢汉与心腹多次商议对策后，决定以辞职试探蒋介石的态度。如果准许辞职，则就此罢休；如不准辞职，则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争取实权。1945年11月5日，卢汉奉蒋介石电从越南飞往重庆，立即向蒋提出辞职要求，这使蒋介石大感意外。虽然蒋介石并不想真正让卢汉执掌云南大权，但觉得还不是换将的时候，他知道李宗黄在云南搞得并不如人意，还需要卢汉坐镇云南，安定地方。卢汉见蒋介石不答应辞职，就此提出自己的条件，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允许设立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取得滇军的人事调整权和省府人事安排权。但是，蒋介石仍有自己的打算，坚持要卢汉与李宗黄合作到底，坚持设立云南省警备司令部，目的是以一政一军、一文一武，遏制云南地方势力。然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因随即到来的“一二·一”运动，最后化为泡影。

1945年12月1日，卢汉在昆明五华山云南省政府驻地举行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云南省主席职。就在当天，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的前奏是昆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罢课运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了实现其专制独裁统治，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积极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内战形势一触即发。面对严重的内战危机，为响应中共中央“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在中共云南地方

^①《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页。

组织的领导下，昆明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决定于11月25日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在李宗黄为首的云南地方当局的高压政策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重重阻挠和破坏捣乱，引起昆明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强烈愤慨。当晚，西南联大率先宣布罢课，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学校也相继罢课，许多学校贴满了反内战标语。到11月28日，罢课学校扩大到31所。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导下，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出版《罢委会通讯》，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校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保障同学的身体自由；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的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的人士致歉等8条要求，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政治主张。在“罢联”具体领导下，《罢委会通讯》发表了《致各师长书》、《告学生家长书》，印发省内外各地；各校出版大型壁报，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演讲，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昆明学生的罢课行动，使国民党云南当局非常惊慌，千方百计破坏罢课。代省长李宗黄召集会议，决定“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组织“反罢课委员会”，遍街张贴“反罢课委员会”的标语，在学生反内战墙报上涂上“赤匪”字样，企图离间中间派的同情，使运动陷于孤立。国民党特务遍街殴打爱国学生，闯入学校撕毁壁报，捣毁校具，强迫学生复课。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镇压手段都不能奏效，于是向爱国师生举起屠刀。12月1日上午，李宗黄在参加了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仪式后，急忙赶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向集中在那里的党徒训话，鼓动他们“以流血对流血”、“效忠党国”。这伙党徒随即和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会合，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分头攻打学校。国民党特务分头冲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工

学院、中法大学等地，用手榴弹炸死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中共党员）、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潘琰（中共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4人。这一天，4名师生惨遭屠杀，数十人被炸伤、打伤，其中重伤20余人。许多市民都充满愤慨地感叹：“这是什么世界！”西南联大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闻一多悲愤地写道：“‘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



昆明“一二·一”运动中，为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的游行队伍

“一二·一”惨案是国民党云南党政军当局有计划、有目的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动，罪魁祸首即为云南省代省长李宗黄、警备司令关麟征和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积极领导学生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惨案发生的当天下午，中共云南省工委立即和学校党组织分析研究形势，决定加强“罢联”领导机构，扩大以学生为主力的战斗队伍，团结教师，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的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击。基于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党组织从斗争一开始就将卢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区别开来，积极争取卢汉的同情与理解，同时发表文告，宣布无限期罢课，呼吁全国同胞支援。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罢联”因势利导，组织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头、下农村、进工厂，说明事实真相，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口诛笔伐国民党反动派，争取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同情与支持。“罢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来悼念四烈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进一步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昆明学生运动迅速席卷省内外各地，在昆明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一场以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浪潮。

“一二·一”运动进入中期后，围绕复课问题，学生与国民党当局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惨案发生后，昆明市大中学生在《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11项要求，把其中7项作为复课条件，即：追究11月25日射击西南联大晚会事件的责任；立即取消24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保障同学的身体自由；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荒谬言论，并向当晚参加大会的人士道歉；严惩12月1日主谋凶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当局应负担死难同学抚恤费和受伤同学医药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学生坚持有条件的复课，国民党当局则要学生无条件复课。12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昆明教育界书》，一方面表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一方面威胁说“目前一切问题必须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同时指责学生罢课“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①蒋介石的《告昆明教育界书》发表后，立即遭到学生们的反驳，罢联发表《读蒋主席〈告昆明教育界书〉后》的文章，逐条驳斥了蒋介石的谬论。为了让学生尽快复课，12月9日，刚刚就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负责人及学生自治会代表座谈复课条件，卢汉对学生提出的有关丧葬、抚恤、赔

^①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7日。

偿损失方面的问题，一口答应由政府全部负担，而对复课谈判的焦点，诸如惩凶、道歉等问题却表示无权处理。学生代表在感谢卢汉的关怀的同时，明确表示在中央负责处置尚无合理解决之前，学生碍难复课。“罢联”公布了谈判经过，并在《罢委会通讯》上发表了《怎样才是合理的解决》的社论，指出学生提出的3点主要要求，“已非地方长官所能有权处理，必须由国民政府明白表示，公正处置”，否则实难复课。10日，卢汉发表《告各校同学书》，威胁说：“诸君若再不复课，听其酝酿演变，倘至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之时，其后果宁复忍言。汉既忝为地方长官，有维持治安之责，又岂能袖手不问？为今之计，惟有服从元首告谕，即日复课，恢复常态，至惨案则应静候法律解决。”^①

此时，卢汉的处境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蒋介石要他出面收拾残局，尽力平息学生运动；另一方面，罢课学生坚持要处理责任人才复课。对于卢汉来说，无异于坐在火山口上，他不出面不行，而出面处理不当，再度引起事端，则“主席”的位置岌岌可危。因此，卢汉一面不断向学生表示同情，进行慰抚；同时也尽力执行蒋介石的意旨，要学生复课。12月11日下午，卢汉前往西南联大悼念死难的四烈士，并对学生讲话，答应保护他们并保障言论自由，并指出关麟征行为恶劣，将受到惩处，但对李宗黄却什么都没说。12月14日，卢汉密电蒋介石，表示“限校长于17日复课，如果无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并称“对于学潮最后处置之准备工作，业已就绪”。^②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云南省工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基于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差异，确定了利用矛盾，中立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争取在适当条件下复课的方针，认为必须转变斗争策略，采取停灵复课的办法，继续开展斗争。

①《“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第3辑，第259页。

②《“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446页。

在党组织的积极引导下，罢课学生修改了复课条件，12月27日，“罢联”宣布复课。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经过爱国学生顽强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2月9日，自知罪责难逃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电呈蒋介石“自请处分”，蒋介石以其“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下令将关“停职，听候议处”，派霍揆彰代理云南警备总司令。12月25日，李宗黄也奉蒋介石之召灰溜溜地离开昆明。烈士的鲜血不仅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也孤立了蒋介石政权及其代理人，卢汉在滇的主要对手就这样被他不击而败，为以卢汉为首的地方势力重新掌握云南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解放战争后期争取卢汉起义创造了条件。



二、审时度势，寻找出路

卢汉掌握云南省的政权后，最初采取了“拥蒋保己”的政治态度。他一方面追随蒋介石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凡事小心谨慎，不敢得罪蒋介石；另一方面积极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对待中共地下组织及进步势力的态度方面，他也是将“保己”作为最高目标，凡是与己无关的事件，他都睁只眼闭只眼；凡是对地方当局及其统治不利的一切活动，他都会毫不留情给予镇压。根据形势的变化，他时而倾向侧重这一边，时而倾向侧重于另一边或第三边，其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保存自己。对此，蒋经国称卢汉“狡狴成性，首鼠两端”。



在施政过程中，卢汉以“在安定中求进步”为主旨，认为最重要的是稳定，“首在如何维持地方治安，力求社会安定，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即所谓“保境安民”。云南历史学家谢本书、牛鸿宾在《卢汉传》中指出：卢汉主滇四年余的施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6～1947年为“求安”阶段；1947～1948年为所谓“求进步”阶段；1949年为“求出路”的反蒋起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主要内容是恢复云南“小圈子”的稳定和维护这一小圈子的利益，中心是重建云南地方上层势力在滇的统治。

卢汉上任之初，原来所辖的滇军两个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到东北打内战，自己手中没有兵权，这使他感到毫无实力可言。因此，他不露声色地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兵权。通过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征得国民党中央的允许，1946年，卢汉开始筹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卢汉兼任保安司令。保安司令部初期辖四个保安大队、一个独立大队。以此为基础，卢汉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增加保安团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加强了地方军事力量。至1949年夏季，卢汉争得蒋介石